

三国时期家学考论

程平

(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0)

摘要:三国时期战乱频仍,民不聊生,教育活动无法正常进行,师学的发展一蹶不振,因此家学成为三国经学授受的主要途径。三国家学教育自有特色:魏、吴两国的经学世家多,传经世数长,蜀国经学世家相对较少,传经世数也很短;三国家学教育的内容开放、实用,经学的普及化程度提高;家学教育的效果显著,为三国、西晋政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。

关键词:三国;家学;研究

中图分类号: K0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1-5957(2013)01-0072-05

师学与家学是经学的两种主要传播方式,是衡量经学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。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,师学似与官学密不可分,而家学与私学则是形影不离。师学在两汉时登峰造极,达到鼎盛,而家学处于附属地位。进入魏晋以后,家学后来居上,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,它既要延续汉代家学的传统,又要变革创新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。因此,三国家学就具有与汉代不同的表现和特点。

一、三国主要的经学世家

三国的经学世家大部分是由东汉而来,曹魏分布最多,而吴、蜀两国相对较少,主要以本土经学世家为主。由于曹魏“九品中正制”的推波助澜,这些世家大族迅速崛起成为门阀士族,他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,垄断了文化,兴盛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。据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史书记载,三国时的世族大家有三十多家。

(一)曹魏经学世家。曹魏著名的经学世家有琅琊王氏、东海王氏、山阳王氏、颍川钟氏等。琅琊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,至两晋之际逐渐兴盛,历东晋南朝,经十数代人,子弟众多,才俊辈出,三百余年冠冕不绝。姚振宗《隋书·经籍志考证》载“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,更魏晋南北朝,一家

正传六十二人,三公令仆五十余人,侍中八十人,吏部尚书二十五人。”^{[1]202}王吉是《齐论语》之名家,他开创了琅琊王氏经术传统,此后,历经两汉、曹魏,数百年间琅琊王氏以儒家经术为世业,如魏末王祥为三老,传道太学,“天子北面乞言,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,闻者莫不砥砺”^{[2]988}。王祥为帝王之师,发扬了王吉奠定的家学传统。

东海王氏的著名代表是王朗、王肃。王朗“师太尉杨赐,……朗著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周官传》,奏议论记,咸传于世”^{[3]406}。王肃“年十八,从宋忠读《太玄》,而更为之解。……为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三‘礼’、《左氏解》,及撰定父朗所作《易传》,皆列于学官。其所论驳朝廷典制、郊祀、宗庙、丧纪、轻重,凡百余篇”^{[3]414}。王朗师从杨赐,学的是今文经学,后来王朗又注《春秋左氏传》、作《春秋左氏释驳》、《周官传》等,这表明王朗是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转变的,这种家学渊源对王肃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
王弼家族。据《魏志·钟会传注》所引何劭《王弼传》记载,王弼之父王业,祖父王凯,王凯为王粲族兄。王粲二子因参与魏讽谋反被诛,魏文帝以王业过继为王粲嗣子,王粲是王弼名义上的祖父。王粲的曾祖父王龚,祖父王畅,都位列汉代的三公,其

收稿日期:2012-09-01 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(08BZW032)

作者简介:程平(1971—)男,湖北荆门人,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讲师,该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。

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“八俊”之一、荆州学派的创始人刘表。王粲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“著诗、赋、论、议垂六十篇”。王粲避难荆州时与宋忠相友善，王弼正是通过王粲继承了荆州经学的《五经章句》以及宋忠的《太玄》。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史有确载。“蔡邕有书近万卷，末年载数车与粲”^{[3]796}，这些书后来为王业所有。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，“幼而察慧，年十馀，好老氏，通辩能言。……弼注《老子》，为之指略，致有理统。著《道略论》，注《易》往往有高丽言”^{[3]795}。

钟繇、钟会家族。钟会出身世家大族，父亲钟繇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政治家，母亲很注意对儿子的培养和教育，夫人“性矜严，明於教训，会虽童稚，勤见规诲。年四岁授《孝经》，七岁诵《论语》，八岁诵《诗》，十岁诵《尚书》，十一诵《易》，十二诵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十三诵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十四诵《成侯易记》，十五使入太学，问四方奇文异训”。因此，钟会“少敏惠，夙成……与山阳王弼并知名”^{[3]785}。

袁涣家族。袁家是典型的诗礼传家的家族，《三国志·袁涣传》载“袁涣字曜卿，陈郡扶桑人也，……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，而涣清静，举动必以礼。”^{[3]333}本传裴注引《袁氏世纪》载“涣有四子，侃、寓、奥、准。侃字公然，论议清当，柔而不犯，善与人交。寓字宣厚，精辩有机理，好道家之言，少被病，未官而卒。奥字公荣，行足以厉俗，言约而理当，终于光禄勋。准字孝尼，忠信公正，不耻下问，唯恐人之不胜己。以世事多险，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。著书十余万言，论治世之务，为《易》、《周官》、《诗传》，及论五经滞义，圣人之微言，以传于世。”^{[3]335}袁侃、袁寓、袁奥、袁准四子或以德服众，或以文传世，家学世家无疑。

(二) 孙吴经学世家。陆氏家族。陆氏世代为江东望族，据《三国志·吴志》所载，陆行“敏淑有思学”，陆骏则“淳懿信厚，为邦族所怀”，陆绩六岁时得到袁术的称许，长成少年时，又得到张昭的赞赏。陆绩的学问广博，“幼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长玩《礼》、《易》”，“博学多识，星历算数无不该览”，著有《浑天图》等。陆逊深谋远虑，文武兼备，屡建大功。陆瑁“少好学笃义”，与陈国陈融、陈留濮阳逸、沛郡蒋纂、广陵袁迪等从中土流落到江东的士人友善。陆喜“亦涉文籍，好人伦，孙皓时为选曹尚书”。陆凯“虽统军众，手不释书。好《太玄》，论演其意，以箠辄验”。陆景“澡身好学，著书数十篇”。陆机、陆云都是著名的文学家，得到了晋司空张华的激赏。陆晔、陆玩都仕于西晋，其中陆玩“器量淹雅，位至司

空”。由此可见，三国时期东吴陆氏的家庭教育渊源深厚，人才辈出。

顾氏家族。吴郡顾氏最为典型，吴县人顾雍平时洁身自好，待人接物据之以礼。顾雍的弟弟顾徽“少游学，有唇吻，孙权统事，闻徽有才辩，召署主簿”。顾雍的长子顾邵“博览书传，好乐人论。少与舅陆绩齐名，而陆逊、张敦、卜静等皆亚焉”。顾雍的儿子顾谭，官至太子中庶子，陆机称誉顾谭“谭以清识绝伦，独见推重”。顾谭的弟弟顾承以通礼学闻名，可见，顾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。

虞氏家族。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。《翻别传》记载虞翻自叙其家学，他说“翻初立《易》注，奏上曰‘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，少治孟氏《易》，曾祖父故平舆令成，纘述其业，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。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，受本于凤，最有旧书，世传其业，至臣五世。’”五世治《易》，家学渊源之深厚可见一斑。

(三) 西蜀经学世家。蜀国有王商王化家族、周舒周群家族、谯氏家族等。关于王氏家族，《华阳国志》卷十一《后贤志》有详细记载“王化，字伯远，广汉郫人也。汉将作大匠王皇后也。祖父商，字文表，州牧刘璋时为蜀太守，有懿德高名，在《耆旧传》。父彭，字仲，巴郡太守。化兄弟四人，少有令望。……弟振，字仲远，亦有德望，广都令，巴东太守。叔弟岱，字季远，恪居官次，历广阳、作唐令，早亡。少弟崇，字幼远，学业渊博，雅性洪粹，蜀时东观郎。大同后，梁州辟别驾，举秀才，尚书郎。与寿良、李宓、陈寿、李骧、杜烈同入京洛，为二州标俊。五子情好，未必能终。惟崇独以宽和，无所彼此。著《蜀书》，及诗赋之属数十篇。其书与陈寿颇不同。官至上庸、蜀郡太守。”

周舒、周群家族。周舒师承杨厚，受阴阳灾异与图讖之学。“群承舒学而益专精之。群卒，子巨颇传其业”。周群在刘璋时为师友从事，蜀汉时为儒林校尉，为地方乡校学官。子巨为博士，其家学渊源较明显。

谯氏家族。谯氏是巴西郡的名门望族。武帝时的谯隆以“忠正”^{[4]921}而闻名，西汉末的谯玄以“高清”^{[4]922}而著称，谯玄“少好学，能说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”^{[5]2666}，并且“独训诸子勤习经书”。其子谯瑛承其家学，“善说《易》，以授显宗，为北宫卫士令”^{[5]2668}，当时有“洁白”^{[4]922}之称，谯周的父亲“治《尚书》兼通诸经及图纬”。谯周经学成就斐然，陈寿称赞他“词理渊通，为世硕儒，有董、扬之规”^{[3]1042}。谯周的儿子谯同“颇好周业”。总之，谯

氏家族可以说是典型的世家大族,家学脉络清晰分明。

诸葛家族。诸葛家族在山东琅琊阳都,先祖诸葛丰生活于西汉武、昭、宣、元四帝时期,是汉司隶校尉,诸葛丰初“以明经为郡文学”,后仕至司隶校尉和光禄大夫。司隶校尉是汉武帝征和四年设置的官位,下辖中都官徒一千二百人,皇亲国戚也要受其节制,权力很大。^{[6]745}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,以“孝廉”或“茂才”之名被古文经学家应劭赏识,初为太山郡梁父尉,后来升为太山郡丞。诸葛亮少失怙恃,由叔父诸葛玄抚养,诸葛玄官至豫章太守,诸葛亮跟随叔父先到豫章,后辗转来到荆州,投靠刘表,“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”^{[3]911}。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字子瑜,“少游京师,治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遭母忧,居丧至孝,事继母恭谨,甚得人子之道”^{[3]1232}。《世说新语》对诸葛亮、诸葛瑾及诸葛诞兄弟有这样的评价“蜀得其龙,吴得其虎,魏得其狗。”^{[7]596}从西汉元帝时的诸葛丰到东汉灵帝时的诸葛亮,这个传经世家人才辈出,诸葛亮应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尹默、尹宗家族。尹默师事司马徽、宋忠受古学,专精《左传》,是蜀汉经古文学家中最富成就者。其子尹宗“传其业,为博士”。虽说不是世家大族,但是这两代的家学渊源是不容怀疑的。

来敏、来忠家族。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一载来敏的先祖来歙治《左氏春秋》,来敏之父来艳汉灵帝时为司徒,好学下士,曾开馆讲经。来敏承其家风,初为先主典学校尉,后为太子家令,皆居学职。善《左氏春秋》,其子忠“亦博览经学,有敏风”。

许慈、许劭家族。许慈善郑氏学,治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“三礼”、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,子勋传其业,父子二人并为博士。

李仁、李譔家族。李譔的父亲李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,师事司马徽、宋忠,当为古文经学家无疑。李譔具传父业,著古文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“三礼”、《左氏传》、《太玄指归》,著述宏富。

常昂家族。常昂家族在《华阳国志·后贤志》卷十一里有详载,常昂的祖父常原,历任牂牁、永昌太守;父亲常高是庙令;从父常闾官至汉中、广汉太守;常闾的少子常忌与常昂齐名,常昂安贫乐道,志笃坟典,治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,涉怡群籍,多所通览。常昂的族兄常骞,字季慎,蜀郡江原人,其祖父竺,字代文,任南广太守,侍中。父伟,字公然,阆中令。骞治《毛诗》、“三礼”,以清尚知名。

任熙家族。任熙的先祖任方是汉安帝侍御史,

大司农,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里有载。父亲任元任汉犍为太守、执金吾。任熙治《毛诗》、《京易》,博通《五经》。

张徵家族。张徵的父亲张翼“字伯恭,犍为武阳人也。高祖父司空浩、曾祖父广陵太守纲,皆有名迹”^{[3]1073}。“翼子徵,笃志好学,官至广陵太守”^{[3]1075}。徵先祖浩治《律》、《春秋》,游学京师,与蜀人谭粲、李郃、张霸结友,霸治严氏《公羊春秋》,郃亦治今文,且皆游太学,则浩所治《春秋》,公羊学也。纲“少以经明行修举孝廉”,则徵所治经学渊源自父祖,当为今文经学。

以上所列举的是三国经学世家的大致情况。相比而言,魏吴两国的经学世家多,蜀国相对少一些。而且,蜀国家学的传经世数很短,有的只可追溯一至二代或者二至三代,如来敏、来忠家族,李仁、李譔家族,许慈、许劭家族等。

二、三国家学的特点

(一) 三国的经学世家不仅数量多,而且传经世数长。一般来说,政治环境比较稳定,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,文化相对来说就比较繁荣。而这些文化繁荣的地区,就是世家大族集中的区域之一。卢云在《汉晋文化地理》中说“三国时,北方拥有最大面积的文化发达区。三国相比,蜀地出人出书最少,实不足与魏吴相侔。吴郡在《三国志》中的列传士人达21人,在全国居于首位。吴郡、会稽士人著书可考者分别达34种与30种,也仅次于东海郡与谯郡。加之吴郡、会稽、丹阳一带还聚集着大量北方流寓士人,那么江左一带可能为全国士人最密集、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了。但江左毕竟仅有数郡之地,广大南方还相当落后,而北方自关中至青徐保持着一个范围广大的文化发达地区,远非江左可比。”^{[8]133}从上文的列举可知,曹魏有琅琊王氏、东海王氏和山阳王氏等大族,孙吴有陆氏、顾氏、虞氏、贺氏等大姓,都在当时的文化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魏吴不仅世家大族的数量多,传经世数也很长,如琅琊王氏家族从西汉一直到隋唐,历数十代,孙吴的陆氏、顾氏和虞氏都是延续好几代。西蜀相比之下要稍微逊色一些。

(二) 三国家学教育的内容开放、实用。从三国时起,家学教育的内容更加简单、开放和实用,更能满足一般人学习的要求,激发起学习者学习的欲望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,首先,书籍的普及化程度在三国魏晋时更高,不像先秦两汉那样藏之于秘府,世家大族家中都有丰富的藏书,这就能满足一

般读书人的读书需求。第二,魏晋学者对经学的内容进行了通俗化的解读,使其内容更能为人所接受。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和《毛诗》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,它们作为启蒙读物,深受儿童和妇女们的喜爱。如《毛诗》在魏晋就出现了许多释义之作、论争之作、注音之作、图画之作等。“魏晋两代的释义之作有14部,足知当时学人热心于《毛诗》的阐释”^[9],阐释的结果使《毛诗》的繁琐程度大为降低。《毛诗》“声韵相协、篇幅短小、易读易诵,却使之成为关注儿童教育的人们最为方便取用的新教材”。^[9]

(三)家学教育的效果显著,出现了许多聪慧的少年,甚至“神童”。家学的效果突出,很多人就是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里成长起来的,有的在很小的时候就崭露头角,侯外庐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中提到的许多早熟夙悟的少年^{[10]64},就是家学教育的结果,如王弼“幼察而慧,十岁通辞能言”;钟会“少敏慧夙成,五岁即知名”;有的成为经学大师,如王肃、虞翻、谯周等人;有的成为政治家,如陆绩、诸葛亮等;还有的成为了文学家,如陆机、陆云等人。

三、三国家学形成的原因

(一)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是三国家学绝处逢生的现实基础。汉末,由于黄巾军起义和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,大一统的封建政权摇摇欲坠,文化建设举步维艰。洛阳官府藏书被“取为帷囊”,全部被毁,私人藏书大多毁于战火,中国学术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。“是则东汉诸帝之所藏,班固、崔寔之所校,凡缔聚于百年者,皆荡扫于一时矣”^{[11]163}。经学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,很多学者被迫流向荆州、辽东、河西、交州等地。其中荆州是容纳关西、豫州一带流民的重镇。“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”,著名的学者有:杜袭、荀攸、繁钦、赵俨、邯郸淳、司马徽、颖荣、石韬、徐庶、杜畿、隗禧、裴潜、杜夔、王粲、王凯、祢衡、诸葛亮等人。如此之多的士人流失,导致官办学校不能正常运转。尽管曹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恢复经学的措施,情况还是不容乐观。据《三国志·王肃传》注引《魏略》序云“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,天下分崩,人怀苟且,纲纪既衰,儒道尤甚……至太和、青龙中,中外多事,人怀避就。虽性非解学,多求诣太学。太学诸生有千数,而诸博士率皆粗疏,无以教弟子,弟子本亦避役,竟无能习学…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,其能操笔者,未有十人,多皆相从饱食而退。嗟夫!学业沉隳,乃至于此,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,各处荒乱之际,而能守志弥敦者也。”^{[3]420}在这种情

况之下,只有家学才能承担起延续传统文化、培养经学人才的重任。对此,陈寅恪说“公立学校之沦废,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,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。”^{[12]19}家学不受时间、地点的限制,随时随地都能进行,更重要的是,家学教育的执行者有于乱世中保持门第不坠的强大精神动力,在教育的过程中,能够尽心竭力,倾囊相授。因此,家学在魏晋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,成为官学教育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。

(二)思想领域的多元化思潮是家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主要原因。汉末魏初,伴随着政治的巨变,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也进行得如火如荼。此时的学术界出现了新一轮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的研究热潮,玄学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同时,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的所谓异端人士,如王充、桓谭、仲长统等人。这些力量的出现,对传统经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,经学要继续推行所谓的纲常名教,就必须为其注入新鲜血液。因此,对经学进行重新的阐释、解读,让大多数人能接受,就提上了议事日程,如上文所提到的《毛诗》在魏晋就出现了许多释义之作、论争之作、注音之作、图画之作等,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魏晋时期还诞生了注、论、评、驳、要略、答问、音、集解等多种体式,这些体式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对繁琐、晦涩的经学进行改革。经学的内容简化,让很多人都能加入到经学教育的行列之中,这与等级森严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官方太学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正因为如此,三国时的女性加入到家学教育中来,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上文所提到钟会的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,在她的教育下,钟会少年就表现出非凡的机敏和才智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十一载“钟毓、钟会少有令誉。年十三,魏文帝闻之,语其父钟繇曰‘可令二子来!’于是敕见。毓面有汗,帝曰‘卿面何以汗?’毓对曰‘战战惶惶,汗出如浆。’复问会‘卿何以不汗?’对曰‘战战慄慄,汗不敢出。’”^{[7]85}蔡邕在《女训》中 also 说“心犹首面也。是以甚致饰焉。面一旦不修饰,则尘垢秽之,心一朝不思善,则邪恶入之。咸知饰其面,不修其心,惑矣。”^{[13]878}蔡文姬是蔡邕之女,是公认的建安文坛一重要人物,文姬自幼受家学的熏陶,展现出杰出的文学才华。可见,三国时已意识到对女性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了。因此,三国时期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家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
总之,三国家学的兴盛不是偶然的,是与当时特定的政治、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。没有汉末的社会

动荡,官学就不会衰颓,家学也就只能作师学的附庸而已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邓名世. 古今姓氏书辩证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6.
- [2] 房玄龄. 晋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
- [3] 陈寿. 三国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4] 常璩. 华阳国志[M]. 巴蜀书社, 1984.
- [5] 范曄. 后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- [6] 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4.
- [7] 刘义庆. 世说新语[M]. 中华书局, 1983.
- [8] 卢云. 汉晋文化地理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 1991.
- [9] 蒋方. 试论魏晋时期《毛诗》的传播与兴盛[J].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, 2010 (11).
- [10] 侯外庐. 中国思想通史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57.
- [11] 陈登原. 古今典籍聚散考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74.
- [12] 陈寅恪.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2.
- [13] 严可均. 全汉文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8.

A Study of Family Tradition of Learn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Wei , Shu and Wu Dynasties

CHENG Ping

(Chinese Poetry Research Centre ,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, Wuhu , Anhui 241000 , China)

Abstract: In the Wei , Shu and Wu Dynasties , war and famine made it impossible to conduct education , which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. As a result , family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main l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lassics. Education at that time had its own features , namely , compared with Shu , scholars of classics in Wei and Wu were numerous , so their instruction lasted longer. What's more , the centents of education were un-limited and practical , which promoted the popularity of classics. Finally , family learning was very effective and had cultivated a great number of brilliant talents for the governments in those countries.

Key words: Wei , Shu and Wu Dynasties; family tradition of learning on Confucian classics; study